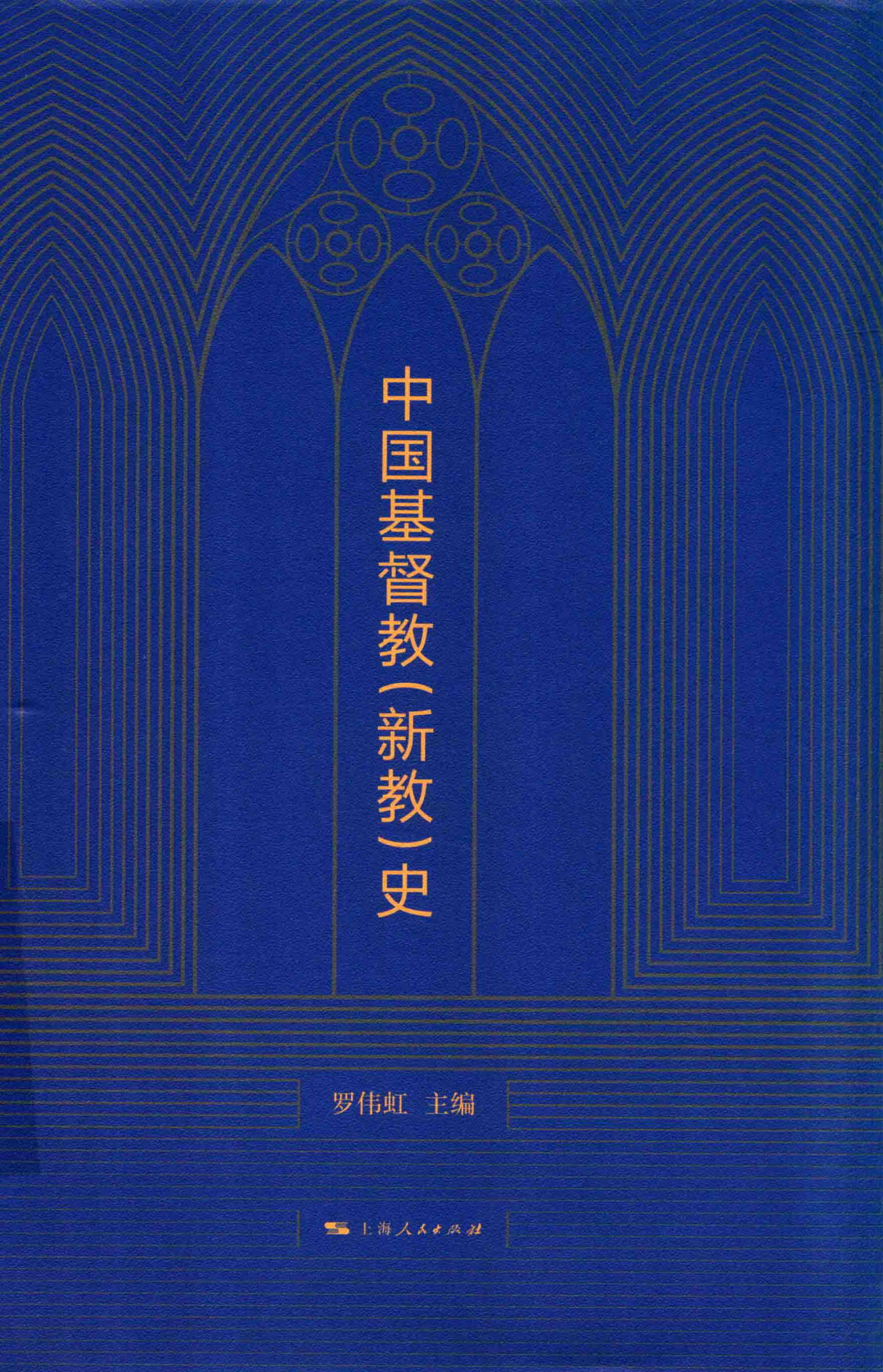




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罗伟虹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罗伟虹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罗伟虹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4067-7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新教-基督教史-中国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3979 号

责任编辑 黄玉婷

封面设计 储 平

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罗伟虹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57 插页 4 字数 811,000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67-7/B·1214

定价 138.00 元

序 一

徐以骅

今年春节期间得暇一口气读完两部中国基督教史著：一部是今年年初出版的美 国加尔文学院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裴士丹(Daniel Bays)的新著《中国基督宗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2)];另一部就是上海社科院宗教所罗伟虹教授及其所主持团队所著《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的书稿。

此两部期待已久的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不约而同的问世,虽属巧合但也是水到渠成,是过去几十年来国内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不断积累和发展的产物。“新的资料的发掘、个案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的扩大、研究范式的涌现、‘补偿史学’的发展”(见笔者为新版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所写的导读)等等,已经为中国基督教新通史著作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在中国基督教通史领域向来横亘着同样出自中外学者的两部标志性著作,即耶鲁大学史学教授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929 年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以及中国基督教学者王治心 1940 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纲》。此两部史著无论在史学观点还是在史料上早已是百孔千疮,但由于在中国基督教史领域既能“含括中西史料与研究观点,又能保持平衡及公允论断的通史著作”(台湾学者王成勉教授语)的难产,故这两部“耄耋老著”还要被翻译,还要被重版,还不时被一些学术论著引用。所幸这两部集此前通史类论著之大成的新著闪亮登场,终于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完全结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内的这一大窘境。

裴士丹教授是美国的基督教史研究的殿堂级人物,也是我所称的美国“宗教知华派”的代表人物。其新著《中国基督宗教新史》不仅是其过去 20 多年来潜心从事的同题材研究工作的结晶,也是美国的基督教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该著是所谓基督教大通史或全史著作,含括天主教和基督教两教,另有关于东正教在华史的附录。如其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由于该著篇幅不大(共 241 页),所以作者采取夹叙夹议、偏重诠释和重新诠释的方式,所发议论以及所做归纳,均显示出极高的研究功力和精辟的学术洞见。在资料上作者也广征博引,基本参阅了西方的基督教史领域几乎所有一线学者的主要观点,也部分吸收了中国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该著既是一部最新的中国基督宗教的简史,又是一部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权威性导读。与西方其他有关论著相比,该著最后关于 1950 年至今的中国基督宗教发展的两章,持论相当公允,且同样富有见地。根据作者在该著和其他论著中的观察,长期以来美国关注以及辩论中国基督教问题的个人和团体,绝大多数对中国所知甚少,因此直到目前美国有关中国基督教的“公共话语”或讨论水准仍十分粗浅,更多在发泄情绪而不是发布事实信息,而且趋于两极化。其实美国对中国基督教的此种可被称为“高情绪化的低水准认知”在对其他宗教以及宗教政策的总体认识上也普遍存在。因此,该著除无可争辩的学术价值外,对当前美国关于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宗教政策的公共话语,也有提升和纠偏的作用。该著作为研究项目 1985 年便得到鲁斯基金会的资助,到结项成书前后历经整整 27 年,终成精品佳作。在国内科研项目往往二三年便需结项的制度下,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现象恐难出现。

罗伟虹教授等所著《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从该课题项目于 2004 年立项到 2011 年完稿结项,也历经 7 个寒暑。罗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基督教史和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且有深厚的家学背景、大量的资料积累以及为数可观的前期成果(包括与姚民权牧师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是主持这一以中生代学者为主、结合学术和教会两界人士的写作团队的不二人选。与裴士丹教授的《中国基督宗教新史》不同,该著是所谓狭义基督教通史著作,以 80 万字的篇幅专写中国基督新教历史,综合中外

史料对中国基督教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细致的叙述。如以“广涵性”作为通史著作的一项标准,那么《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应更具通史的恢弘气象。《中国基督教(新教)史》深耕细作,以叙述见长,且偏重国内(包括港台地区)学者的近期研究成果,因此更能反映国内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现状,与偏重西方研究成果的《中国基督宗教新史》可说是各有千秋。初看起来,《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似并无贯穿全书的主线,但仔细琢磨,窃以为该著“三个时期”(即“清末时期”、“民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编排别有深意,不仅开创了中国基督新教史“三时期说”的宏大叙事格局,而且显然蕴涵着基督教与不同性质中国社会互动的基本写作线索。“三时期说”中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一编,从1949年一直写到21世纪初,大大突破了中国基督教通史以及其他基督教史著通常不逾越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间界限的潜规则,其对三自革新运动的起源、联合礼拜的原委、中国学术界关于宗教性质的“鸦片之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演变的浓墨重彩的叙述,以及在一些地方对史学研究空缺的填补,这些都成为该著的亮点。

不过该著第三编“社会主义时期”在颇为出彩的同时,也是全书最有争议的一编。由于在国内编撰中国基督教会史需背负“学术和教会的双重之轭”,而中国基督教会尚未与中国共产党同步正式对1949年后自身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过拨乱反正的重新评价,因此《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在第三编“就事论事”和“述而不论”的写作指导思想虽使其不用回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基督教会的历次重大事件和运动,但在处理这些事件和运动上却远不如前两编那样进退有据。该著在演绎“主旋律”的同时,对一些基督教两会系统之外或社会基督教现象,如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文化基督徒”、城市教会、各种打着基督教名义的极端教派、网上传教、港台地区的基督教发展、未登记教会等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对此罗伟虹教授在本书的前言中已作了部分说明。至于当代中国基督教运动尤其是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国际意义,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范围内使基督教开始与西方脱钩的历史进程的开端之一,并在客观上开创了中外宗教交流史上的“后传教时代”或全球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后中国大陆时

代”,《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也同样未予以适当的关注。不过裴士丹教授的《中国基督宗教新史》对此也只是一笔带过。其实对于上述现象包括《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写作团队成员在内的国内学者已发表过不少论著,因此本人认为罗伟虹教授及其团队完全有条件从容处理这些对一部完备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来说需要涉及和研究的现象。

2004年罗伟虹教授及其团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来从事本书的编撰工作,现在给出的成果却是煌煌80万字的鸿篇巨制,达到了“非项目导向”的真正学术著作的高度。作为罗伟虹教授的同行人和故交,本人在此对她和她的团队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表示衷心的祝贺。

2012年农历正月初七于上海西郊寓所

序 二

曹圣洁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以耶稣降生于巴勒斯坦肇始。其门徒传教至欧洲后所建立的教会,于 1054 年分裂成东西两大部分,东部称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西部称为“公教”(Catholic Church),1517 年德国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以后,又把“新教”(Protestant Church,又译“抗罗宗”)从罗马公教分裂出来,以致广义的基督教有了上述三大分支,现在学术界常统称为“基督宗教”。东正教在我国的影响不大。过去在我国的译文中,把公教译成“天主教”,而把新教译成“基督教”,以致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使人以为天主教与基督教是两个不相干的宗教。其实二者同出一源,但在教义、礼仪等方面确有很大不同,在组织上截然分开。本书书名中的“基督新教”^[1],乃是我国通常所称的“基督教”,或“耶稣教”,本书也就是一般理解的《中国基督教史》。

基督教(指新教,下同)近代传入中国,自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1807 年来澳门活动算起,已近两个世纪。作为外来宗教,它在我国虽然随着社会的变迁跌宕起伏,却始终保持生长的活力。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之势更居各教之首。为此,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一直备受国内外、教内外人士的关注,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历史书却凤毛麟角。民国时期,基督教学者王治心于 1940 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纲》至今仍被认为是现代影响最大的一本通史,但它仅是史纲,而且 1900 年以后的部分相对简略。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基督教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走独立自主道路,与过去的面貌有天壤之别,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

后,教会复苏又蓬勃发展,其历程极其独特又具深远意义。港澳台以及外国学者中有人从不同角度论述这段历史,但作为局外人,很难要求他们完全反映事实的真相。其中有人因对新中国抱有异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国的政教关系,甚至把新中国内的基督教历程说成是“受迫害”的历史,产生误导。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大陆尚未有一本专论基督教历史的著作。

本书主编者罗伟虹研究员多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基督教研究。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于1981年由宗教学前辈罗竹风提议创建,并定下宗旨为当代宗教研究。2000年她与另一位研究员姚民权(牧师)合作撰写了《中国基督教简史》,甚受欢迎。2004年,她联络同仁,决定在原有基础上深入拓展,申请本书的立项,历时7年,终告完成,填补了我国基督教历史专著的空白,无论从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的研究来说,都是一项重要成果,值得庆贺。

研究历史,首先必须详细占有史料。我国基督教1949年前出版物较多,如1922年出版的《中华归主》就是外国差会在我国传教事业的详细调查统计。难的是1949年以后的教会变化情况,仅有《天风》、《协进》等少数基督教刊物上的零星资料可供查阅。为此,不少研究书籍或文章的内容只写到1949年,或至多到1958年(之后由于宗教政策受到“左”的影响,基督教明显萎缩)。本书的作者们知难而上,尽量收集材料,一直写到2002年,在当前已经出版的史书中是最接近现状的。

从收集史料的范围来说,本书的作者们主要立足于国内的文史档案以及教内的记载。但他们不仅是从书本出发,而是力求厘清事实的演变过程。例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以及50年代的发展经过,反映了中国基督教带根本性的转折,教外很难体察。由于上海宗教研究所所有接触实际、注重调研的传统,主编者又具有与基督教机构及人士比较熟悉的优势,能够比较感性地触及各种起作用的因素,所呈现的情景也就更加具体,具有更大的可信性。

写历史并不是堆砌史料,而是必须把史料放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内去再现,才能复原客观的历史事实。宗教的组织存在于社会之中,它的兴

衰与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书在每个历史发展时期,都清楚地阐述了当时的形势特点,并把它与基督教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例如清末教案的发生与列强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关系;非基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特别是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内为何能比较顺利地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使人既看到其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看到基督教人士为超越本身不利条件而作出的努力。

在大量掌握史料以及这些事实发生的条件以后,写史者必须客观公正地进行历史评价,才能由表及里,使人认识历史的真实。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在1949年以前,严格地说,只是外国传教差会在我国的传教史。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赖特烈在1929年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自序中就说明,该书未用《基督教在华史》作为书名,因为他作为西方人,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关注他们的教会生活,彻底了解中国基督徒的灵性经验。他希望中国人能从自己的角度写中国基督教史。

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传播是靠着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及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外国传教士听命于传教差会,而差会总的说来是竭力维护本国政府利益的。这些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也为国际上严谨的学者所公认。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教会除传教以外,在我国又办了不少教育、医疗、慈善等文化福利事业,介绍西方先进文化,对我国的现代化起了促进作用;外国传教士中有人自觉地为侵略政策服务,也有人在传教的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好事。这种种情形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图画,评价相当纠结。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完全接受西方片面观点,认为传教事业纯粹是中西文化交流,与政治上的侵略无关,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初期,为强调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也曾全盘否定外国传教士良好的传教愿望,一概称之为“帝国主义分子”,是不公正的(现已纠正)。本书在有关的历史叙述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让多方面的事实说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立场相当客观。

在国家饱受侵略之苦,基督教被称为“洋教”,与人民对立的日子里,中国基督徒如何既持守所珍爱的基督教信仰,又不失中国人民的爱国情

怀,是无法回避的挑战。其抉择既与国家的命运有关,也与教会的前途相系。本书对基督教自立运动、本色化努力,以至三自爱国运动发起过程的追溯,从历史的角度作了说明,有其特点。

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是一个大工程。本书的作者们虽尽了很大努力,不能说已全备完美,特别在引用境外材料并与境外作者的著作进行比较方面,尚显不足。然而它确是一本基础性的专著。由于基督教在我国社会上的一定影响,它不但与中国基督教密切有关,对于我国的文化事业也有参考作用。

现实就是过去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基督教的前景离不开对历史的认识和辨析。记得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首任主席吴耀宗在1962年就提出过,需要有人不仅编写《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史》,也要撰写《中国基督教史》。我作为基督教界的一分子,感谢本书的出版,系统地保存了我国基督教的史料,也留下了极有价值的见地。我更寄希望于基督教内的知识分子,深入开展历史研究,把握历史演进的规律,以史为鉴,认清并指引基督教前进的方向,为使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曹圣洁

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2年元月

注 释

- [1] 本书原社科基金课题名为《中国基督新教史》,现已改为《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主编

前 言

本书所称基督教(新教)即英语 Protestantism,是指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同天主教脱离关系的各基督教派。新教在中国也被称为基督教、耶稣教。为表示区别,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支派)称为基督宗教,而将狭义的基督教称为基督新教。本书的国家项目题目为《中国基督新教史》,但有部分学者和教会人士提出还是沿袭传统的称谓较好,经考虑,遂将书名改为目前的《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罗马教廷使节东来、明清时期天主教耶稣会的活动,以及鸦片战争以后的天主教和新教,此外,还有东正教的活动,但影响不大。前三次基督宗教来华后都没有在中国立足。直至 19 世纪初基督教天主教借助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和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至今在中国发展已经有 200 年历史。本书主要是研究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历史。为了对基督宗教来华传教的历史有完整的了解,在“导论”中,将 1807 年以前天主教、东正教,以及新教在台湾的传播情况作概要叙述,为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

19 世纪初基督教进入中国,恰与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近代史的开端吻合。中国大门被打开,与基督教有一定的关联。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形成涵盖面极广的影响,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关系纵横交错,所涉及的领域广,人物多,事件重大,发展曲折。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

社会变迁和事件,都有基督教参与其中。但在我国主流的历史书中,一般都没有涉及基督教的内容,基督教史研究处于边缘状态。在相当长时期中,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只是在基督教内进行,社会影响很小。

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早期撰写并关注教会史的主要是中外教会人士,尤以外国传教士为主,不少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所写的回忆、报道、介绍,都是当时的传教史。外国传教士主要从传教事工的角度来写,更多关注差会、传教士的活动,如美国传教士来会理的《新教差会史概要》,主要介绍各差会在华的概况。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的《新教差会在华百年史(1807—1907)》,主要统计、总结新教来华百年各差会在华历史及其传教事工。而作为经典之作的美国著名教会史家赖德烈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也主要是从传教的角度撰写。

早期中国教会人士也写了一些基督教布道方面的历史,如谢洪赉于1918年刊印的《中国耶稣教布道小史》,陈金镛于1929年写成《中华布道史》等。在中国基督教人士所写的教会史中,最有影响的是王治心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纲》,这是一部基督教通史著作,内容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但在新教上用力最多,虽然出版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仍是目前最为权威的著作。

上述著作在历史上具有很大影响,但因成书年代久远,其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大陆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几乎空白,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中国的港台地区与美国,如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卡瑞—爱尔魏斯著《中国和十字架:差会史研究》,赖德烈曾为该书写有书评,有一定影响。台湾有基督教学者杨森富著《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出版了周亿乎《基督教与中国》和李兆强牧师的《十字架与莲花》。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学者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李志刚著《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邢福增著《回溯教会路》,梁家麟著《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此外,还有韩国李淑宽著《中国基督教史略》等。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材料的占有和分析方面做得较为详细,方法论上也有独到之处,为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开拓了视野。

1949年后中国大陆学术界基本与世界隔绝,直至1980年以后,基督教史开始作为一门学科得到重视,不少学者从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医疗、文化事业,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外关系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其中涉及通史且影响较大的成果有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姚民权、罗伟虹合著《中国基督教简史》,段琦著《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等。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基督教史在专门史和地区史方面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丰硕的成果,不少研究视野开阔,资料丰富,分析入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仅涉及中国基督教史的某一阶段或某一部分,在时间上一般不超过20世纪中期,在内容上也不够全面。因而,“中国迄今缺乏一部贯穿古今、史料翔实、立论新颖的中国基督宗教通史著作”(卓新平语)。

为填补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的空白,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国基督新教史”课题,本人及其团队接受了这一项目,经过7年的努力,直到2011年初通过专家评审结项,完成此课题。

我们确立的研究原则是: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史的大背景,从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基督教的发展;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为主线,把握基督教在华历史的复杂演变和曲折发展,区分不同时期基督教传教和中国教会成长的不同特点;对基督教进入中国至今200年的历史作全方位、多领域、多角度考察,力求全面系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力求史料翔实,分析客观。

作为一部通史,本书的时间跨度为1807—2002年^[1],力求对基督教传入中国近200年的历史进行认真梳理,按基督教在华传播时中国的时代变迁,分为清末时期(1807—1911)、民国时期(1911—1949)、社会主义时期(1949—2002)进行论述。这三个时期是中国社会体制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基督教是在与中国社会互动中发展的,在每一大时代下,基督教都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有着不同的社会评价。

中国基督教史的开端是西方传教士和差会的活动,毕竟基督教是西

方传教士主动“送”上门的。19世纪初,传教士带着强烈的基督教文明优越感,拯救异教徒的使命感,征服异教文明的热情,靠着殖民主义庇护强行进入一个已经在政治经济上走向没落,且与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的东方国家。在肯定传教士献身精神,以及为传教付出种种努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当时许多传教士的活动并不是纯宗教的,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不惜依附于政治,攀结于商业,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正因如此,随着基督教传教区域的扩展,激起中国社会强烈的“排异”反应,使传教事业受到很大损失。直到民国时期政教关系改善以后,基督教才进入传教的“黄金时期”:传教地区扩大,信徒人数增长,教会事业全面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传教士与西方国家政治利益的紧密关系,使他们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中美关系恶化,西方传教士全部离开中国大陆,传教事业被迫停止。

本书更重要的是追溯中国基督教会的成长轨迹。中国基督教徒自立自办教会由弱到强的发展,始终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步,尤其是在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以及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等时代潮流推动下,不少华人教会领袖和学者开始觉醒,对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及本色化议题进行思考,并付诸实践,引发了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民间还出现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以及由中国信徒自发创立的,具有本土特点的教派。虽然受时代局限,中国教会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的发展并不顺利,中国教会的领导权依然为外国差会和传教士所控制。但是,由此而激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主意识,涌现出来的一批爱国爱教的教会领袖,都是中国基督教宝贵的思想财富和人才资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时代的推动和基督教界爱国进步人士的努力下,中国基督教进行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三自爱国运动,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关于三自运动的历史,国内研究基督教史的学者几乎未有涉及,基督教界也仅做过一些片段的研究,而海外学者的研究因立场迥异,对三自运动基本上是否定的。尽管三自运动发生的时间距今仅60年,有人认为基

基督教史可以不必纳入,但我们认为三自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国基督教史如果缺少这一部分是不完整的。由于三自爱国运动的起伏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因此在研究三自运动时,更注意考察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研究大变革时代社会对基督教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人士所作的回应,既肯定三自爱国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也不回避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所发生的“左”的思想路线对三自运动的干扰和破坏。在收集资料时,我们除了翻阅一些书面资料外,还作了一部分口述采访,尽量客观公正地作出历史评价。但由于目前还有许多档案没有公开,有许多历史事件因缺少资料而无法深入,本书对某些问题留有空白,希望以后能随着社会的开放而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作为历史著作,本应与当代基督教发展保持一定距离。但本课题的历史终点放到 2002 年,是想完整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基督教的变化和发展,如果仅写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三自运动,只是基督教变化的开端;写到 60 年代,因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无法正常反映基督教的活动;只有把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的发展变化包括进去,才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中国基督教的真实面貌。但由于时间距离太近,本书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作一概述,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政策、宗教理论等方面全面的拨乱反正,中国基督教两会各项工作的推进,以及近 30 年基督教发展概况等,目的是为后人写这段历史留下一些资料和参考。因本书的重点是历史,对当代中国基督教出现的许多新趋势、新情况、新问题,暂不作深入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本书 1949 年以后主要是写“社会主义时期”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基督教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两岸四地的基督教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很难将台港澳地区的基督教包括其中,因而没有列入。

本书以史学与宗教学相结合,通过对中国基督教史的阐述,特别是对其从初传时期与中国社会的对立和对抗,到后来教会力量的扩充,以及中国基督教人士逐步推行自立运动、本土化和最后走上“三自爱国”发展坦途的全过程扫描,全面揭橥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轨迹,以及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与中国社会发生的摩擦、碰撞或适应。以史为鉴,只有了解基督

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努力及其教训等历史史实,才能对今后中国基督教会组织的良性稳妥发展,起到直接而又有益处的借鉴和警示作用。

本书是集体工作的成果,写作者包括学界和教界(具体名单详见“后记”),作者都是长期研究基督教史或中国历史的学者。他们对本课题抱有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来没有一个成员抱怨课题经费太少而放弃,相反,因获取资料的成本提高,有些人为了节省经费,经常连续多天到档案馆、图书馆抄录资料,表现了良好的职业精神。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历经7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专著。在此我要向课题组全体成员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还得到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历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曹圣洁牧师,始终关心课题的进展,她在审读初稿后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尤其有不少基督教专业知识方面的意见,使我们避免了一些错误。此外,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华东神学院图书馆在资料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在出版方面,本书有幸得到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许仲毅先生的热情帮助。

在此对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的人,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受到时间、经费、资料等因素的限制,本书肯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希望出版后能得到各方面的指教,也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罗伟虹

2012年1月

注 释

[1] 因课题于2004年开始,故当时定于写到2002年,但由于有些工作具有延续性,所以2002年以后的部分事件也有涉及。最后一节在基督教人数统计方面,采用了2010年的最新数字。